

大遗址活态保护的贾湖实践

武艳芳

贾湖遗址距今约9000—7500年，核心保护区面积约6.5万平方米，是一处规模较大、保存完整、文化积淀极为丰厚的新石器时代前期聚落遗址，研究成果丰硕，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载人人教版《中国历史》教科书。如何让沉睡地下的瑰宝真正“活起来”，走进当代生活，贾湖考古遗址公园交出了一份创新答卷：以遗址展示为核心，以村庄一体为特色，以精彩活动为抓手，以研学教育为引擎，构建起文化遗产“保护—阐释—传承—发展”的活态循环体系，走出一条遗址保护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的新路子，为中华文明探源、提升文化自信作出贾湖贡献。

让遗址说话，释放文旅融合魅力

贾湖遗址充分展现遗址博物馆的特色，被评为2023年全国考古遗址保护展示十佳案例。遗址保护展示区，于2016年完工，包括贾湖遗址保护展示工程、环境整治工程等，遗址核心区的风貌得到科学呈现与有效保护。保护棚、探方复原展示、重要遗迹标识等手段的运用，使考古成果变得可视可感；周边的村庄环境提升，使贾湖村成功获评市级美丽乡村，为后续的文旅融合创造了良好的生态与人文环境，构建了遗址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的基础框架。

贾湖遗址博物馆，2023年对外开放，占地面积50亩，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科普宣传、互动体验等功能于一体。陈列展区采取“1+4”模式，精心设置“礼乐之源——贾湖文化主题陈列”和“贾湖探秘”等4个专题展，分设封闭式展区与开放式展区，静态展览和互动游戏有机结合，达到各展其能、内外互补的效果。开放至今参观观众已突破40万人次，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文化传播地、旅游目的地，被评为2023年度河南省优秀陈列展览、2024年度河南省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优秀案例。

贾湖考古遗址公园计划分期建设，一期包括博物馆公共配套设施、旱溪景观、绿化种植等，已完工并投入使用，与博物馆周边风貌相协调；二期提升工程，以“文化内涵”为脉络，以“体验展示”为延伸，植入现代科技手段，打造融合遗址复原展示、多学科研究中心、贾湖文化体验区等的文旅综合体，集知识性、体验性、休闲性于一身，让历史从书本和展柜中真正“走”出来，融入观众的感官与记忆，目前正在加快落地。

与村庄共生，彰显“村遗一体”特色

贾湖考古遗址公园依托遗址特色，结合贾湖乡村肌理，融合乡村资源，尤其是在村民家里，整体打造可以体验、可以互动、可以传播的空间，让人们看到贾湖、感受贾湖，爱上贾湖。通过贾湖村内设置的文化体验、千年贾湖美食等内容，形成村遗一体、以农户为单位的“活的博物馆”，遗址公园与村庄实现有机融合，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探索文化赋能增收路径。

贾湖村以文化资源为密钥，构建“遗址+农户+产业”的联农带农机制，打造政府、村民、村集体、社会力量多位一体的共生乡村振兴样板，有效改善贾湖遗址周边人居环境，通过“一户一策”改造计划，将部分村民住宅升级为文化主题庭院，实现室内景象与室外景观的呼应，打造微型文化节点。未来，随着贾湖骨笛、绿松石饰品等品类文创产品的开发，将进一步带动就业人数增加，为大众提供近距离触摸史前文化的机会。

以活动引领，促进文物赋彩生活

贾湖考古遗址公园坚持文物活化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脉搏共振，不仅将传统节日、文化庆典转化为遗址叙事的舞台，还以各个主题活动日为契机，利用直播平台打破地域限制，将宣教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传统节日的创新演绎：端午“巧手制香囊”活动，孩子们在缝制艾草香囊中感悟驱疫祈福的古老智慧；六一“穿越九千年”游学，儿童们在惊叹声里触摸历史；新春“墨香迎非遗”活动，书法春联与唢呐雕刻共展，非遗技艺重焕魅力。

国际主题日的深度参与：5·18国际博物馆日推出“听文明的声音”直播与陶艺工坊，周年庆生盖章活动引发打卡热潮；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传承匠心”为主题，线上线下联动吸引全民参与文物保护。

社区与校园的浸润传播：“贾湖文化图片展”多次亮相社区、校园，强化公众参与遗址保护的观念，推动大遗址保护全民共建共

享；馆长多次进校园、进社区、进机关宣讲，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讲述贾湖故事，让学术成果闪耀在基层的文化土壤。

云端直播的文化穿越：“博物馆里过大年”直播活动，围绕解析“年”文化，揭秘贾湖饮食与工艺；“穿越时空的味蕾”直播从贾湖饮食溯源至现代漯河食品产业，观众纷纷点赞；“了不起的博物馆”馆长与文史大咖带领观众畅游博物馆，最高在线观看人数近10万，将专业考古知识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盛宴。

沉浸贾湖的场景活化：当观众步入遗址公园，不仅能看到芦苇荡漾，湖光粼粼，也能看到“贾湖人”捕鱼、碾稻、吹笛的场景，观众也可亲身挑选穿戴仿制的先民服饰，化身“贾湖人”，在复原的房舍或湖畔留影，这样的情景互动不仅是趣味的角色扮演，更让贾湖先民形象更加立体丰满，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参观体验。

名校平台的广域传播：2025年上半年，贾湖遗址博物馆精心挑选代表文物亮相复旦大学博物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溯源”展览，这不仅是贾湖文物首次走进长三角，也是首次成功与高等院校搭建起交流渠道，下半年计划和清华大学博物馆合作，如此以文物为媒借力顶尖高校平台，必将带动贾湖文化的宣传投射至更加广阔的范围。

国际舞台的文明回响：2025年6月，由河南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跨越山海文明对话”专场文艺演出在联合国总部启幕，当贾湖骨笛奏响第一个音符，这位穿越8000多年的文明使者证明中华文化基因中始终涌动着与世界共振的磅礴力量。

借研学筑基，构建活化教育平台

教育功能的深度释放是文物“活起来”的重要路径，为此贾湖考古遗址公园构建了一套以研学为主体的文物活化机制。沉浸式场景重构：借助场景复原等手段重现贾湖先民的生活图景，悠扬骨笛奏响礼乐初音，炭化稻粒彰显农耕智慧，龟甲刻符勾勒汉字雏形……博物馆内“礼乐之源”主题展骨笛、龟甲与符号等专题展，通过分龄化设计和智慧导览，让各年龄段观众均能“听得懂、看得进”。数字化创意展项：贾湖遗址博物馆内结合展厅布局，在多个点位设置数字化创意展项，融入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综合体验模式，将虚拟信息与真实世界巧妙联结，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亮”起来，让观众“动”起来。例如利用MR（混合现实）技术，策划“粮食加工台”展项，设置水车碾磨脱壳体验；利用雷达投影互动技术再现先民葬礼场景；利用人工智能、5G技术设置“与贾湖人对话”展项，观众可即时与虚拟人物互动等。趣味互动体验：贾湖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外设置陶器修复拼合游戏、捕鱼达人情景模拟、骨笛演奏家、趣味石匠铺、文字华容道、贾湖人比身高等多个游戏点位，极大提升幼龄儿童的参观体验。还特别开发植物拓染、陶泥塑形等精品课程，在亲手印染布帛，玩转陶泥的过程中，历史知识悄然内化，文化自信油然而生，一年内吸引5万余名师生参与。孩子们指尖揉捏陶泥，与九千年前陶器上的指纹痕迹“隔空对话”，这种“古今重叠”的触感，正是文物生命力最直观的传递。

贾湖考古遗址公园让遗址“活起来”的实践绝非简单展示，而是构建起“教育为核、科技助翼、活动为媒、公众参与”的良性系统。从研学体验的欢声笑语，到直播互动的文化盛宴；从陶泥上重叠的古今指纹，到春联墨香中的非遗传承……贾湖考古遗址公园正以9000年的文化积淀为基，用创新之手点燃文明星火。未来，随着“村遗一体”深化与数字技术的迭代，贾湖遗址将继续探索活态保护的新方式。

（作者单位：漯河市贾湖文化研究服务中心）



贾湖考古遗址公园陶艺制作研学课程



贾湖考古遗址公园捕鱼场景演绎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明清襄阳城墙形制特征与保存现状综合研究

程禹农 陈柏伦

近年来，襄阳城墙出现墙体鼓胀、坍塌等险情。虽已及时开展抢险修缮，但因城墙体量庞大、隐患隐蔽，预防性保护难度较大。本研究通过实地勘察、文献梳理和科学检测等方法，系统调查了城墙的历史沿革、建筑形制及病害特征，旨在全面掌握其保存状况，为后续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依托该研究指导，完成《襄阳城墙西门至夫人城段保护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和《襄阳城墙襄阳公园后门段修缮工程勘察设计方案》，对襄阳城墙后续的保护工作也起到了极大的助力作用。

襄阳城墙的历史沿革

襄阳城的兴起依赖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汉水过古城后转为近东西向奔流，至襄阳城东触大洪山余脉山地折转南下，将南襄盆地与襄宜平原南北分开。文献表明，襄阳县于西汉后期设置于楚北津（戌），治于襄水之阳而得名。

襄阳原为县制，东汉末年王睿作为荆州刺史时改郡制，后刘表将荆州首府由江陵迁至襄阳。

刘表将荆州治所迁襄阳后，于城东另筑州城，并将原县城称为垒城。刘宋时，竟陵王刘诞于城外加筑罗城，襄州刺史张邵于城外筑长围，襄阳城始有外城。南朝末至唐前期，襄阳城再次东迁，唐诗谓其时的城垣周长九里，乾道七年始于城门外建瓮城，襄阳城在西汉筑城时为土城，宋时将土城改筑为砖城，始以青砖包裹城垣，并将单一直进直出式城门改为屯兵式的瓮城门。

明初，湖广行省平章邓愈在毁于元末的襄阳城旧址上进行重建，将城墙南两面外扩约400米，同时将城墙向东扩建，城垣周长增至12里，垣墙减至“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脚阔三丈”，东南西三面开凿宽近百米的城濠。

城墙的营造与格局

襄阳城居于汉水中游之南岸，其城三面临水，一面接山，是十分理想的城市环境基址。《读史方輿记要》载：“檀溪界其西，岷首亘其南，汉水如带萦乎东北，楚山若屏峙乎西南，天然之形势也。”

襄阳城墙平面略呈矩形，因其临江而建，且经过不断迁移与改造，造就了其独特且合理的平面格局。城池的纵横主轴线和城门并不处于城墙的中心位置，究其原因是明初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导致的。

明《天顺襄阳郡志》记载：“……通周迴二千二百一十一丈七尺，通计一十二里一百三步二尺；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五尺，脚阔三丈。”按明清营造尺寸，一丈约合3.2米，二千二百一十一丈七尺约为7077.44米。

依据考古勘探资料分析与文献记载比对，通过无人机倾斜摄影测量技术构建襄阳城墙的实景三维模型。城墙东西两面分别长约2.2公里、1.6公里，南北两面分别长约1.4公里、2.0公里，周长约7.2公里，围合面积约2.5平方公里，与文献记载的数据近乎一致。由此基本可以确定，今襄阳城墙延续了明清襄阳城墙的基本格局。

我们按区段对特征明显墙体的断面尺寸、墙面坡度、相对标高等尺寸信息进行了测量记录以作比较，各项数值总结如下：

外墙和内墙均为砖墙的区段。游路宽度介于1.7米至12.3米之间，均值为7米；外墙高度介于4.1米至10.7米之间，均值为7.4米；内墙高度介于2.7米至10.9米之间，均值为米；外墙坡度介于74°至89°之间，均值为81.5°；内墙坡度介于76°至86°之间，均值为81°。

外墙为砖墙，内墙为夯土的区段。游路宽度介于1.6米至16.1米之间，均值为8.85米；外墙高度介于3.8米至14.5米之间，均值为9.15米；内墙高度介于1.8米至12.2米之间，均值为7米；外墙坡度介于74°至86°之间，均值为80°；内墙土坡坡度仅小北门东侧土坡坡度较大，接近90°，其他区域介于17°至59°之间，均值为38°。

墙体结构特征

襄阳城墙为夯土包砖墙，采用分层夯筑法建造而成。截面特征为：墙芯由灰土夯筑而成，外墙以青砖包砌，内墙则分为砖墙和土墙两种，据此可分为“夯土单面包砖”和“夯土双面包砖”。城墙顶部铺慢青砖地面，外墙上雉堞。

夯土采用掺了石灰的细粒径土（主要为细砂和黏土）逐层夯筑，多为400米一层，夯土间以碎砖瓦作为骨料。青砖外墙主要由面层砖和背里砖组成。面层砖多选用大块城砖，丁顺砌筑、白灰缝，墙面收分至拔檐；背里砖以白灰浆坐浆卧砌，上部较下部略宽，与夯土叠压。面层砖与背里砖咬搓搭接，形成整体。整个砖墙厚度或能达1200米左右，其卧于厚约3至5米的夯土墙芯上，形成稳定的自重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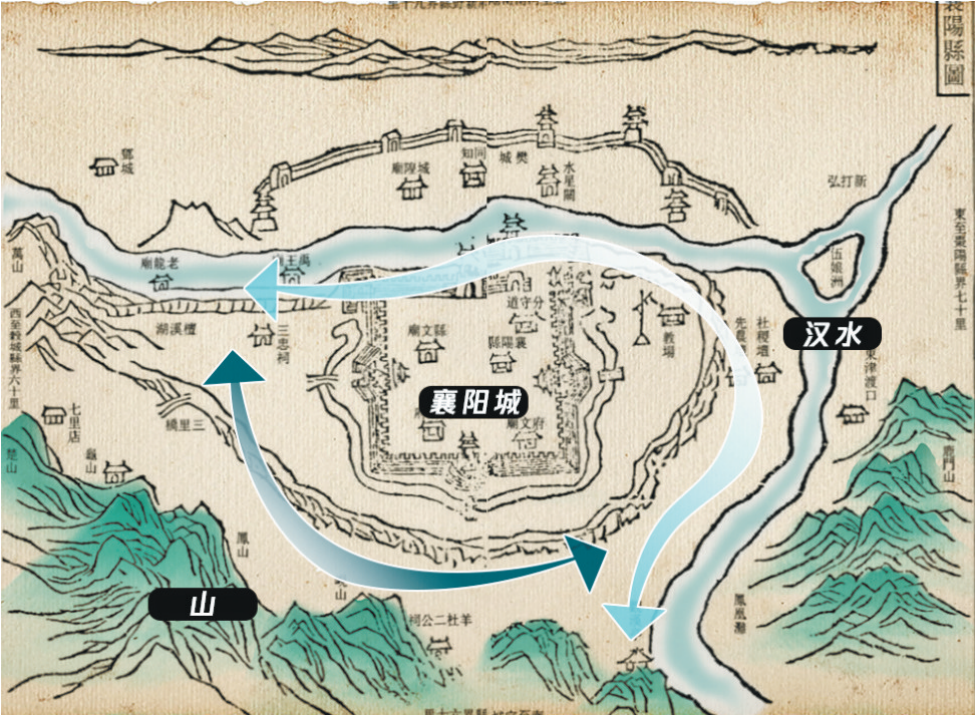
根据历年来的工程档案资料及现场勘察研究，现状襄阳城墙的砖墙与夯土墙结构形式存在以下三种：

包砌墙体。以2层厚城砖贴砌老墙面，以砂浆粘接。包砌砖墙较薄，新旧墙体搭接不密实，部分老墙残缺的部位或以碎砖堆砌或以毛石垒砌，同步修补的夯土层也存在用料随意、夯实不严等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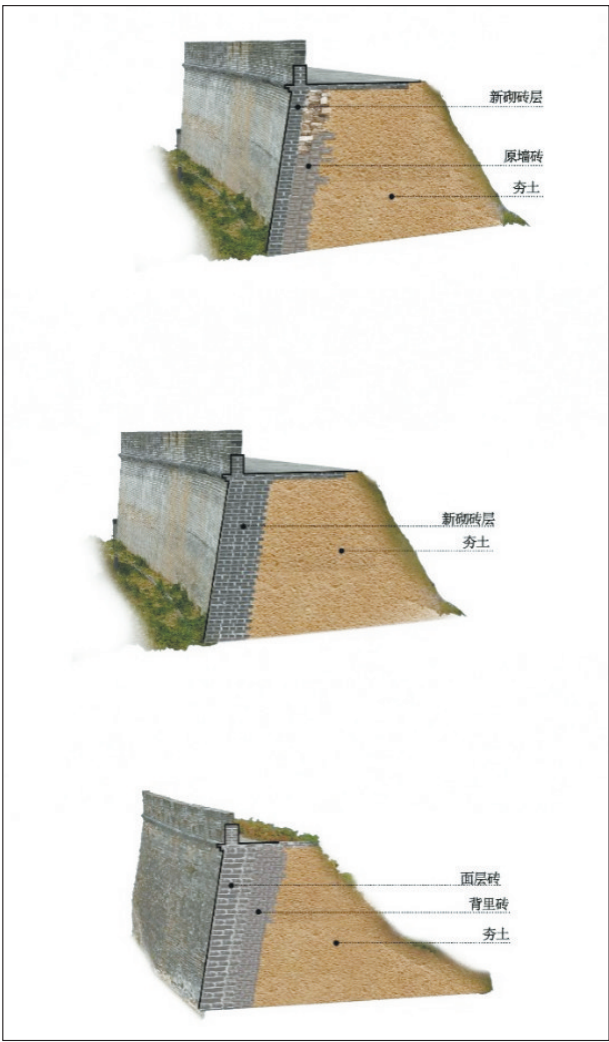
新建墙体。旧墙砖缺失严重的墙体在后期完全以新墙砖补砌，大多未按面层砖和背里砖样式恢复，而是采用单一尺寸的青砖收分砌筑成型，墙体厚度不一。

原始墙体。遗存的明清城墙墙体，虽然局部少量存在材料修补和更换，但主体结构特征和形制做法没有改变。

通过研究墙体构造，我们发现部分墙体在逐年修缮或整治的过程中，产生了明显的变化，究其原因大多是由于不



襄阳城墙山水形势图（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墙截面类型对比图（至上而下分别为：包砌墙体、新建墙体、原始墙体）（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当修缮和改造导致的，如襄阳城墙西门至夫人城段部分城垣段改造为“外墙内室”的构造，与原始“外包砖、内夯土”的砌筑方式有所不同。此外，部分早期经过重砌的墙体，采用了砖石填充，现浇钢筋混凝土板的方式维持结构。

同时，通过现场的测量和研究不仅发现了材料变化、砌筑杂乱等问题，也通过构建三维模型、观察墙体倾斜度等方式判断该段城墙主要的病害问题包括：墙体开裂、墙面鼓胀、砖件风化、生物病害。

通过分析城墙具体问题，我们能系统地给出相关设计措施，其中包括：剔补受损较为严重的青砖、更换受损严重的青砖、统一砖件规格，拆除重砌墙体鼓胀松散严重的部位，对裂缝进行灌浆加固等多个角度的修缮措施。

根据该分析可以看出，襄阳城墙的保护是以前期研究和勘察为前提和基础，在不断探索中不断理清设计思路和方法的过程。

襄阳城墙真实性定性及定量分析

襄阳城墙在落成的几百年间屡遭自然灾害和战火，但城墙墙体基本保持完整。后因城市建设等活动，襄阳城墙部分墙体损毁缺失，城墙不再连贯完整，局部垣段又经过多次修缮甚至重建，真实性及完整性受损。

根据勘察分析，我们依据襄阳城墙的保存现状情况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包括：地上部分基本完全缺失的城墙、经过复建的城墙、原始城墙。

完全缺失的城墙，具体位置及量化数据如下：东门及瓮城（城门缺口36米，瓮城外轮廓长约113米）；南门及瓮城（城门缺口185米，瓮城外轮廓长约143米）；西门及瓮城（城门缺口50米，瓮城外轮廓长约156米）；小北门瓮城（瓮城外轮廓长约100米）；长门以南的城墙（长约500米）；铁路桥下的城墙（长约56米）。

复建的城墙，具体位置及量化数据如下：异位复建墙体：南门两侧城墙（长约455米）。原位复建墙体：西门南侧城墙及昭明小学段城墙（长约266米）。

城墙总长按全景三维模型测量的7200米计，缺失城墙为1339米，复建城墙为721米，则原始城墙为5140米。明清城墙占比约为71.39%，缺失城墙占比为18.60%，复建城墙占比为10.01%。

研究证实，明清襄阳城墙主体结构仍保持明初“包砖筑城”工艺传统，同时识别出近现代修缮形成的新构造特征，呈现明显的时代层积现象。研究发现，墙体内部材料性能梯度变化与历史修缮层叠加密切相关，不同区段材料性能差异及环境因素显著影响墙体劣化程度。建议建立重点区段动态监测体系，将评估结果转化为保护措施。

（作者单位：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